

教育与女性自我实现：《傲慢与偏见》的启示

景思彤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在近代英国工业化背景下，女性社会地位与受教育程度收到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全面打压，被边缘为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他者。本文以《傲慢与偏见》中三位女性角色的自我塑造与婚姻选择为例，借助马洛斯需求理论、波伏瓦他者理论和朱迪思·巴特勒性别表演理论分析探究教育对女性自我与自我实现需要的影响。

关键词：教育；女性；自我实现；傲慢与偏见

引言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代表作之一，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十八、九世纪的英国爱情故事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十八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新兴期。自由平等新思想兴起，但宗教和封建时代思想对人，尤其是女性的禁锢依旧深刻。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受限，思想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的全面渗透。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层，要求人们充分发挥自我潜能达成自我期望形象的自我实现需要是人类最高等级的需要^[1]。不同于文学作品对女性的思想压迫，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展现出较强的自我教育意识，积极追逐自我理想形象，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其好友夏洛特虽同样具有自我教育意识，但被时代对女性的角色要求裹挟，没有产生自我实现需要；丽迪雅懒惰不爱学习，仅产生生理层面的需求。教育程度是否真正影响女性自我实现进程？本文以《傲慢与偏见》中女性角色为例，从马洛斯需求理论角度探讨教育与女性实现间的关系。

一、近代英国工业化背景下女性地位与女性教育观的桎梏

十八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发展的新兴期，工业革命的到来为英国带来开放、自由的新思潮，同时也为旧社会生产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十八世纪中期后，资本主义的入侵宣告了以女性劳动者为主的家庭经济的死亡。女性失去主要社会劳动场所，经济和社会地位受到了双重削弱，成为“闲妻”，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受到严格限制^[2]。同时，大量男性劳动力被吸纳进工厂，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得到显著提升，男性角色进一步

由家庭转向社会。男性在家庭责任中的角色缺失迫使女性进一步承担家庭内部责任，家务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一种低值化趋势，这种状况进一步固定化，最终形成了妻子和母亲的道德责任——将其自身全部奉献给家庭的社会观念^[3]。波伏瓦他者理论提出：定义和区分女性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4]。这一时期，封建时代与基督教所推崇的男尊女卑、阶级固化思想依旧深刻，女性被视为男性的所有物，被异化为男权社会权利外的他者，受教育权被基本剥夺。当时的教育学家认为女性过多地接受正式学科教育会妨碍她们进行家庭服务^[5]。直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初等教育部正式认可的初等学校女子教育项目仍仅包括家务技能教育^[6]。自十八世纪起，大量针对年轻女性的品行手册出版，女性的品行标准由男性决定，被要求具有鲜明的性别特质。“所学的一切，无不明显地具有一定有用目的：增进她肉体上自然的丰姿，形成她内心的谨慎、谦逊、贞洁及节俭等美德；教以妇道，使她将来不愧为家庭主妇等等^[7]。”在十八世纪欧洲社会，女性是男人的贤妻良母和奖品，没有自我价值，是被异化在社会之外的他者。

二、丽迪雅、夏洛特和伊丽莎白的婚姻选择与需要理论

（一）丽迪雅的婚姻选择——生理需求

关于贝纳特家的教育情况，伊丽莎白在前往柯林斯家做客时回应道：“我们姐妹中凡是想学的不会缺少学习的途径。父母总是鼓励我们阅读，必要的老师我们也有。如果有人想偷懒，当然也是有可能的^[8]。”贝纳特家可以接触到较好的教育资源，但受教育程度全凭自我。马洛

斯需求理论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需求与对性欲的需求一起归类为生理需求，生理需求是人类需求中最初级的部分^[1]。由于母亲的溺爱和父亲的疏远，丽迪雅懒惰不爱学习，“没有教养、不知羞耻、吵吵嚷嚷、无知无畏”^[8]。她的性格特征和家庭教育在她的婚姻选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与积极抓住机会通过教育完成自我塑造的伊丽莎白不同，丽迪雅对教育的看法完全继承于母亲，认为教育对女性无用。丽迪雅忽视教育的态度，限制了她对自我价值和社会角色的深入理解，减弱了她分析和评估潜在伴侣品质的能力。缺乏足够的家庭指导和正面榜样，她过于偏重于表面的魅力和短暂的情感满足，对即时满足的需求高于对长远利益的考虑。因而，在她的爱情幻想中：“自己坐在一顶帐篷里，柔声细语地同时和至少六个军官打情骂俏”^[8]。痴迷于和军官打情骂俏，丽迪雅完全忽略了财产安全对于女性的利害。在她看来，“这些财产与军官们佩戴的徽章相比一文不值”^[8]。因此，当英俊的军官威克姆对她展开追求时，丽迪雅立刻接受并与其私奔，完全不在意伴侣的品性。教育在形成个人价值观和判断力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对教育的忽视，丽迪雅只能看到最低级的生理需求。她并未发展出财产安全乃至个人尊严的需求，心甘情愿成为男性的战利品与男性社会的他者。

（二）夏洛特的婚姻选择——安全需求

夏洛特是伊丽莎白的好友。与贝纳特家五姐妹相比，她年纪略大、相貌普通，家境也不太好。她同样通过自我教育得到了一些知识，这使她在婚姻选择上树立起明确的目标——稳固的财产安全保障；但不足以支撑她在社会意识的压迫下向内寻求自我，跳脱出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义。十八世纪的英国奉行长子继承制。除嫁妆外，女儿无法从家族中获得任何财产。在财富积累的工业革命时期，没有财产就意味着没有生活的保障。马洛斯需求理论提出：个体希望获得安全的心理活动即对安全的需求^[1]。夏洛特深知女性在这一时代的悲惨地位。她希望为自己谋得合适的婚姻来获得生活保障，以满足自己的安全需求。得益于一定程度的自我教育带来的思考能力，夏洛特对婚姻有着深刻的认识。她对婚姻持肯定而消极的态度：“对于一个受过教育但家境不好的年轻女子而言，婚姻是防止她们日后生活捉襟见肘的最好保障”^[8]；“婚姻幸福与否完全是一种偶然。”^[8]。夏洛特在肯定婚姻对女性的必要性的同时对这样的婚姻感到悲观，展现出她的自我觉醒：她不认同普世择偶观中女性以牺牲自

我价值的方式可以换来美满婚姻的观点。在向众人解释婚事时她说：“我只想有个舒适的家”^[8]。她的选择反映了一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她的婚姻选择不仅是对安全需求的直接回应，也是她个人价值观与现实情况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揭示了夏洛特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和对可行性选择的理性评估。她明白，在当时社会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既不年轻也无财产的女性，她的婚姻市场价值受到限制。因此，她选择了一条能够确保她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的道路，即使这条道路并不完全符合她对婚姻的理想期待。尽管夏洛特的自我觉醒意识远远胜于丽迪雅，但由于时代的教育禁锢，她对婚姻的选择仍被裹挟在男权社会的意识压迫中。马洛斯需求理论指出，人的需求都是逐级满足后诞生的。夏洛特虽然通过自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自我独立，但她的教育程度不足以使她挣脱社会禁锢，寻求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三）伊丽莎白的婚姻选择——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

“伊丽莎白敏锐，个性也更强势一些，判断力也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8]。作为贝纳特家最伶俐的女孩，在教育资源对女性紧闭大门的十八世纪，伊丽莎白积极利用家族资源进行自我教育，并最终培养出了独立的自我和敏锐的洞察力。正是教育使她脱离其他麻木个体，能够敏锐察觉出他人对女性的傲慢，绝不容忍自我尊严受侵犯。“如果他没有怠慢我，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原谅他的傲慢”^[8]。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其他女性不同，伊丽莎白在开篇就展现出对尊重的需求，这反映出她在社会对女性自我牺牲式“贤妻良母”要求下对独立、自尊理想女性形象的追求。伊丽莎白将自我视为追求目标，跳脱出女性仅是男性实现自我满足附体的视角，普遍地拒绝被审视，展现出对自我的追求。在意识到达西的转变后，伊丽莎白立刻察觉并摒弃自己潜意识中未被发觉的傲慢，在追求自我理想形象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自我尊重的需要被满足时会导致自信、价值和能力体验、力量及适应性增强等多方面感觉；而阻挠这些需要将产生自卑感、虚弱感和无助感^[1]。伊丽莎白在故事开篇就展现出对尊重的需要，但这种尊重需要在男性社会得不到满足，反而引发她的自卑与无助感。伊丽莎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但由于教育与角色禁锢，她无法理解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只能用对他人的偏见将自己伪装起来，将自己推离追求的理

想女性形象。因此，她将达西的傲慢视为不可更改的品行，直到亲眼见证达西的改变后才羞愧地意识到自己陷入社会对女性“虚荣”性格的捏造中：“我的愚蠢不在于爱情，而是虚荣^[8]。”此外，男权社会的意识覆盖强调男性必须是强势的，这实际上也是对男性的角色压迫。朱迪·巴特勒在性别表演理论中指出：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是表演性的^[9]。这意味着性别实际上是由不断重复在某种性别观点下的扮演性行为决定的，而不是天生固有的。这一点在男女主身上尤为明显。伊丽莎白本身受到社会“女性”观念的教化较浅，展现出一种“男性”的自信与坚强。然而，达西的傲慢刺痛了她的自尊心，难以被满足的尊重需求不断打压她的自我，使她产生自卑与虚弱感，变得“虚荣”，不自觉地被禁制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中。而达西本人也同样被禁锢在家庭教育与社会对他“男性”要求的禁锢中，直到被心上人以与社会主流观点相反的反叛态度回绝时才开始正视自我角色：“是您让我知道，对于一位值得自己付出感情的女士而言，单凭口头上博得她的欢心是远远不够的...我的双亲，尽管为人很好但是却允许、鼓励，甚至是教会了我成为一个自私、傲慢的人^[8]。”达西的傲慢是社会意识与父母教育下对“男性”角色的反复扮演。他同样不属于男女性角色的理想定位中，但无法达到更深层次的思考，直到伊丽莎白的反叛式自白才终于打破他的“扮演性”行为，开始展现一种谦虚的“女性”特质。二者的性别气质流动是性别表演理论的有力佐证。在这一过程中，达西因伊丽莎白而完成自我革新，伊丽莎白也借助达西完成自我实现，女性不再是男性的点缀品，而是自我与他人的影响者。伊丽莎白成功跳脱出女性的他者形象，完成自我实现。

总结

十八世纪的英国是女性教育的黑暗时期，教育封闭剥夺了女性的生存权利与社会地位。在《傲慢与偏见》一文中，简·奥斯汀借伊丽莎白、夏洛特与丽迪雅三人的

婚姻与自我实现情况体现了教育对女性自我实现的重要意义：帮助女性从十八世纪男权社会下女性的他者身份中跳脱出来，否定社会强行赋予女性的角色定义，实现由他者到自我的角色转变并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在现代社会，针对女性的教育封闭已得到很大改善，女性能够得到更多的教育机会，但社会对女性的教育歧视仍然存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意识仍对女性呈现出性别与角色上的压迫。为此，我们可以从《傲慢与偏见》中获得启示：以自我教育突破社会对女性的角色限制，最终完成自我实现。

参考文献

- [1] 吴宏伟.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及哲学底蕴[J].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06(2): 4. DOI: 10.3969/j.issn.1008-8520.2006.02.011.
- [2] 王建香. 共谋抑或颠覆?——18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含混的女德主题[J]. 国外文学, 2013, 33(01): 63-69. DOI: 10.16345/j.cnki.cn11-1562/i.2013.01.006
- [3] Bridge Hill. Women. Work and Sexual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1996.
- [4]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11): 108—545.
- [5] 潘迎华. 论19世纪后期英国“白领女性”的兴起与女子教育的发展[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02): 100-107.
- [6] Meg Gomersall. Working-class Girl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M]. London: Macmillan, 1997.
- [7]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87.
- [8] 简·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M]. 孙丽冰,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 [9] 朱迪思·巴特勒. 不确定的基础: 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问题[A]. 后现代转向: 社会理论的新视角[C]. 223—224.